



烽火 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六十年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

lishi bianqian yu lishixue

姜义华 等著

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火軍火皇 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

lishi bianqian yu lishixue

姜义华 等著

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姜义华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ISBN 978-7-208-08869-6

I. 历... II. 姜...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1949~2009 IV. K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9962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储平

· 辉煌60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

历史变迁与历史学

姜义华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91,000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69-6/D·1607

定价 23.00元

辉煌 60 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潘世伟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克梅	吕 贵	刘世军	芮明杰	杨 扬
杨洁勉	李明灿	吴 铎	何勤华	宋 超
张伟江	陈章亮	罗剑明	周鹤龄	郝德良
荣跃明	姜义华	袁恩桢	莫建备	晏可佳
桑玉成	彭希哲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理论与社会实践互动中的成长

（总序）

潘世伟

6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成立的宣示响彻云霄，不仅是近现代的中国奋斗历程，同时也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人间沧桑辟新道，弹指挥间一甲子。在这波澜壮阔、凯歌行进的60年里，共和国的英雄儿女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在制度创新方面，新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在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探索中走在前列。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新中国先是在被包围遏制的状态下坚持自力更生，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尔后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奋力追赶，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在人民生活方面，新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初步的小康，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方针，永远结束了被侵略受压迫的屈辱历史，有效化解了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所有这一切，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也必将作为整个人类争取文明进步的光辉一页而载入世界史册。

如此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实践，必将作用于精神观念层面。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艰难起始于20世纪交替之际的苦难岁月，其曲折发展始终依傍于中国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除旧布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打开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素材，造就了初步繁荣的美好春天。

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60年的创造性实践,其间,跌宕起伏的曲折没有使他们萎顿,剧烈急速的转型没有使他们迷失,内外重重的困难没有使他们消沉,接踵而来的成就也没有使他们陶醉。中国学者坚持与实践同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进,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继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历史性作用。

在这60年中,中国学者的努力大致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深刻把握现实世情、国情。在新中国发展的每个时期,中国学者都十分注重认识外部国际环境,也非常注重分析国内现实状况,他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和规律的准确判识,使理论创造和学术成长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其二,努力推进主流理论构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力地提高了执政党的理论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也有力地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其三,深入研究发展路径和模式。中国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努力探寻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以社会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任务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方案,并且力求在评估发展成果、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其四,竭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亿万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也形成了物质生活改善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强烈需求。中国学者为此开展了多种样式、多个层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工作,弘扬大众理性,创造共同精神家园。其五,坚持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本着古为今用的准则,中国学者梳理典籍、研究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六,积极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学者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文明优秀成果的敏锐感知,并以不懈的努力,介绍来自外部世界的前沿信息、最新知识,使这些有益要素融入中国,转化为帮助自身成长的新动力。

所有这一切表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学术与社会之间、理论与实践

之间、学者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实践发展呼唤学术理论，学术理论推动实践发展，两者之间互为支持、互为促进。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构建与发展加速而行。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得到弘扬，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得以形成，内容丰富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气得以倡导，新老结合的学术队伍得以扩大。概言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期。

在纪念新中国诞生 60 周年之际，上海学术界萌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和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双重视角出发，回溯发展轨道，梳理成长脉络，总结变化规律，形成科学阐释。为此，我们组织上海各主要学术团体、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协同努力，以团队的力量分别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与其依托的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联，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学术成长。通过这样的努力，以期重新再现新中国的伟大发展实践如何深刻影响学术成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新鲜活力，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得到有效传承，世界人文学术优秀成果如何得到重视和引进，各类思想文化资源的集聚如何为人文社会各个学科发展提供丰厚养分。当然，由于丛书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能力所限，我们未必能够达到这个预期的目标，丛书各卷存在的种种不足，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最后，我们依然重申这样的信念，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伟大实践，还是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未来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独创性，决不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简单复制，而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样，立足于这一发展实践之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将行进于一条不完全相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目前，我们尚处于这条道路的起始端。更好地解读中国变革，反映中国发展，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模式，传播中国价值，形成中国风格，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2009 年 9 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革命布新与人的解放:史学责任新担当 / 1
- 第一节 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 / 2
- 第二节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年代里 / 8
- 第三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历史学的新发展 / 13
- 第四节 人的全面发展:新世纪的史学职责 / 17
- 第二章 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国史视域新拓展 / 22
- 第一节 国史研究的基本概况 / 23
- 第二节 维护国家独立、统一与安全 / 29
-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团结 / 36
- 第三章 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农耕文明新审视 / 48
- 第一节 农业生产力的研究 / 49
- 第二节 传统经济再评价 / 54
- 第三节 农民、乡村社会的过去与未来 / 61
- 第四章 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史研究 / 79
-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 / 79

第二节	中国城市史研究概况	/	82
第三节	中国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	/	87
第四节	秦汉至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	/	89
第五节	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	/	92
第六节	“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	/	97
第七节	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与城市精神	/	99
第八节	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与中外学术互动	/	102
第五章	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	/	107
第一节	毛泽东时代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	108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十五年	/	116
第三节	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趋势	/	123
第四节	普世的现代性与特殊的文化认同	/	131
第六章	欧洲中心与全球视野:史学体系新构建	/	138
第一节	“欧洲中心论”在中国	/	138
第二节	重构世界史的探索之路	/	146
第三节	全球视野下的历史:从“现代化”论到“全球史观”	/	155
第七章	与共和国同行的上海史学家	/	164
第一节	史坛重镇	/	164
第二节	“左”的干扰下艰辛耕耘	/	166
第三节	敢为天下先的建树	/	168
后记		/	172

第一章

CHAPTER 1

革命布新与人的解放：史学责任新担当

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历史学以其时序性、整体性、实证性，获得其他学科无可取代的特殊地位，为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与它们内涵的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前行的坐标。历史学帮助人类肯定并不断提升自身的价值，通过认识先前各个世代积累和遗存下来的各种主客观资源，了解自己在什么条件下生存，在什么既有的基础上和环境中进行再创造，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丰富的知识，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势，使自己在所从事的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能够处于越来越自觉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高度重视。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觉投身于这一斗争，成为这一伟大斗争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奋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新中国建立以来,和新中国成长的历程相适应,当代史学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年代;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岁月;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总目标的历史新阶段。

第一节 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

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1949年7月1日,由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历史学学术团体,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成员之一,参加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代表为陈伯达、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候补代表为胡绳。与会的还有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如吴玉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郭沫若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周谷城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候补代表,嵇文甫为华中解放区代表,吴晗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代表,汤用彤为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邓拓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这些历史学家和其他代表一道,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会议宣言,确定国旗、国歌,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正式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1951年7月28日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为郭沫若,副主席为吴玉章、范文澜,常务理事为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尽管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组成的具有民间性质的学术团体,但是,从它一诞生起,就显示出史学研究同时又是一项国家行为,它的命运和新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伊始,便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置于国家行为这一重要地位,将历史学作为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而奋斗的一条重要战线,突出地表现在作为国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国科学院1949年11月成立后,立即将组建历史研究专门机构作为重要任务提上日程。1950年1月,首先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澜任所长;8月,建立了考古研究所,由郑振铎任所长;1954年

又建立了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分别由郭沫若、陈垣任所长。1953年10月，中共中央还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任主任，成员有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尹达等人，成为中共中央专门指导全国历史研究的权威机构。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所以被置于国家行为这一重要地位，出于构建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适应的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出于清除长时间来唯心史观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影响的需要，也是出于总结和吸取优秀历史遗产服务于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这一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第44条又专门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家事务。”这两条规定明确指出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时代使命和神圣职责。

正因为用科学的历史观研究和解释历史及经济、政治、文化及国家事务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新中国建立不久，便在全国干部与群众中普遍开展了社会发展史教育。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①当时在广大工人中开展的社会发展史教育，重点是教育工人们树立劳动创造人，劳动光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

1950年春，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着手编辑《毛泽东选集》。从1951年7月开始，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一批文章在《人民日报》提前刊载，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1951年10月，第1卷出版，1952年4月，第2卷出版，1953年4月，第3卷出版。结合《毛泽东选集》的陆续出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不仅在干部中，而且在知识分子中广泛展开。人们不仅通过学习熟悉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熟悉了毛泽东关于中

^①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399页。

国历史的一系列论述和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主要观点,更多历史学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观点来重新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

1953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全党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现在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都学习《联共(布)党史》的第9章到第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这个学习计划,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为此开辟了专栏,刊登辅导论文、资料、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学习心得。学习者在学了一年以后都得进行考试,他们还要写出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学习第9至第12章以后,从1955年9月起,各级干部又被规定要进一步学习《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第1至第8章。对一部外国的党史教科书如此认真地仔细阅读、学习,充分显示了这一段特殊历史的研究与解释,同党与国家的实际工作关系是何等密切,也进一步说明了借助学习和解释历史来统一全党干部乃至全国人民的思想,以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并确立其支配地位,是何等被重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一百多年中,思想文化领域内原先由以儒表法里为主干、并汇合儒释道诸家而成的意识形态长期全面控制的局面急速崩解,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开眼看了世界,接受了新思潮的知识分子中,它的支配力一步步丧失。为了构建足以支撑中华民族复兴而能凝聚全民族的新的意识形态,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康有为试图通过建立新孔教构建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新孔教只沦为一些遗老遗少自恋自慰的一种精神慰藉;孙中山试图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内涵的新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是在孙中山本人那里,或是在孙中山后继者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蒋介石或宋庆龄、邓演达那里,三民主义的诠释歧异过大,结果,三民主义不但统一不了全中国,甚至也统一不了国民党自身。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混杂,派别纷纭,更无法成为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以统领全国的权威意识形态。新中国的建立，使构建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并确立其支配地位空前迫切而必要，也使构建足以凝聚全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了现实的可能。

建立统一的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对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党史，学习联共（布）历史和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著作，都属于这种正面教育。然而，建立统一的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确立起支配地位，更需要首先在作为社会引领者的知识精英中清除各种与此相悖相异的思想意识。对他们当然也需要进行正面教育，但是，要真正清除在他们中根深蒂固的原先思想意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还专门选择了一批“反面教员”、“反面教材”，通过对这些“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批判，来强化和深化这一教育。于是，就有了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了胡适思想批判、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以及在反右斗争中历史学界专门进行的反对右派历史学家的斗争。

毛泽东在修改 1951 年 5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加写了大段文章，清楚阐明了这一批判的普遍性意义，就在于通过树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来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

毛泽东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认为：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

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①

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这场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影响之深广,在随即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立即表现出来。

批判《武训传》高潮中,北京大学率先开办了暑期学习班,刚走马上任的马寅初校长组织教职员集中学习40天。毛泽东随即肯定了这一做法,要求在全国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地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教师 and 行政人员以及高中以上学生中展开,其中一项突出的内容,就是“忠诚老实交清历史”。在火药味很浓批评火力极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参加者得仔细检讨自己以往的全部历史,这成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和其他文教机关中“反动遗迹”的重要根据。历史不再是遥远过去的事,而是直接关联到每一个人自身的工作处境和未来出路。确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就这样通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落实到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

1954—1955年开展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发端于对俞平伯《红楼梦考证》一书的批评,目标不仅仅是肃清胡适本人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是整个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及民众中的影响。

这场批判运动席卷整个学术界。中共中央宣传部秉承毛泽东意图发动了这场批判运动。根据当时议定的计划,由历史学家郭沫若挂帅,历史学家侯外庐负责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范文澜负责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尹达负责评价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还有胡适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批判等,但历史学无疑在其中承担了重大责任。

与胡适思想批判同时展开的,还有梁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也都涉及历史观。1957年反右斗争中,一批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北京大学的向达、王重民,复旦大学的王造时、陈仁炳,南开大学的雷海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317页。

^② 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82—483页。

宗，广西师范大学的黄现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近代史研究所的荣孟源等，几乎各历史研究机构和大学历史学系都在本单位揪出了若干“右派分子”作为批判斗争对象。通过对所有这些“反面教员”的批判，与新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那些思想被摒弃，被贬斥，至少不能再公开宣扬，统一的新的意识形态从而极为强势地被确立起来。

最为明显的成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胡绳等人的通史或断代史专门史著作牢牢占领了各大学历史学系讲坛，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全部重新编写。史学界环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被称作历史学中“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环绕着如何将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运用于中国历史发展而展开，古代土地制度、农民战争及汉民族形成问题，所涉及的也是如何将马克思的土地问题理论、恩格斯的农民战争理论和斯大林民族问题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固然从不少方面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些讨论，让史学家们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使被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新意识形态具有坚实的中国历史基础，证明新意识形态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所以被定位为国家行为，还因为新中国虽然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新中国所面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所面对的人们的日常思维、生活习俗，无不留有极深的历史烙印。建设新中国，不能不全面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先前全部世代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怎样支持着又怎样制约着新制度的建设和新生活的创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从毛泽东本人开始，就一直非常注意从以往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智慧。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一开始工作，便根据毛泽东 1942 年《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的“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的建设，决定立即组织队伍，着手编辑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 年正式成立了总编辑委员会，成员为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从 1951 年开始，陆续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容量甚大的专题资料丛刊。在近代中国经济史方面，由

一批经济史专家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铁路史、对外贸易史等各种专题的多卷本资料集。在这一基础上,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水准相当高的许多研究成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54年开始校点《资治通鉴》,参加者有王崇武、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顾颉刚、聂崇歧等一批著名的史学家;从1958年开始校点《二十四史》,由吴晗、顾颉刚主持,参加者有全国数百位历史学者。与此相配合,由吴晗牵头,谭其骧负责,重新编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成为后来的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出版的还有各种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会要等史籍,以及其他一大批重要历史文献、历史资料。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和新中国的建立与巩固相适应,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坚实而丰富的资料整理工作相结合,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气象。

第二节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年代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据此,共同纲领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部分第1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装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根据这一根本方针,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

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实现了普遍中农化,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当时,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少量流转,其实这很正常,也不难依法控制与限制,可是,它们恰被夸大为在农村中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根据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普遍地、大量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